

## 论早期黑格尔的“爱的宗教”<sup>\*</sup>

范志均

---

**提 要：**黑格尔早期宗教思想发生了一次转折，由康德式的道德宗教转到“爱的宗教”上来。如何理解这种“爱的宗教”，其本质是什么？目前学界尚未提出和思考这一问题。从黑格尔对道德和伦理的区分来看，“爱的宗教”肯定不是道德宗教，而应是一种伦理型宗教。

范志均，东南大学哲学与科学系副教授，博士后。

关键词：道德宗教 爱的宗教 伦理宗教

---

西方自启蒙时代以来形成了对宗教的理性解释。激进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站在理性的立场上，把理性与信仰对立起来，彻底解构了非理性的宗教，达到了无神论。英国的自然宗教和德国的道德宗教虽然都捍卫理性的权利，但并没有完全拒绝宗教，而是有限度地承认理性范围内的宗教，只是自然宗教侧重于抽象理智对宗教的合理性论证，而道德宗教偏重于实践理性，把宗教看作内在于人的道德需要。不过启蒙主义从人性出发去看宗教，却各抓住人性的一面，撕裂了人性。法国启蒙主义者抓住工具化的理智和趋乐避苦的感性瓦解了宗教，英国自然神论者以抽象的理智主义删减了宗教，康德基于实践理性建立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而无论自然宗教还是道德宗教都抽掉感性，一味强调理智或理性的优先性。与之相反，卢梭猛烈抨击启蒙主义的理性宗教，召唤恢复基于情感的自然宗教。

黑格尔是在启蒙精神的光照下成长起来的。但是在图宾根，他开始着手研究宗教时，却并没有完全被启蒙精神俘获，反而一定程度上逾越了启蒙精神对宗教工具性的理解。相较而言，他认为情感对于宗教是更为本质的东西，宗教终究乃是心情的事情，人们是用心而不是理智感受上帝的行动、奇迹和临近。但是他并没有像卢梭那样由此走向另一极，把宗教完全等同于单纯情感主义的主观宗教。他力图让主观宗教容纳客观宗教，感性补充理性，“使得宗教的教义和力量可以渗透进入的情感的深处，从而成为人的行为的

推动力，并表明其自身在他们那里是有生命力的、是有作用的。”<sup>①</sup>他把这种整体性的宗教称之为民众宗教。他意图用这种民众宗教克服启蒙宗教的偏失，恢复基于完整人性，并与生活连为一体的真实宗教。他发现历史上只有希腊宗教是这种民众宗教，因为它不仅“建筑在理性的深刻道德需要上面”，而且满足了希腊人的幻想和心情，“同生活的一切情感友好相处”，还因其公众性哺育了一个自由的民族。他否定基督教是民众宗教，因此对基督教采取了批判态度。

在伯尔尼，启蒙精神在黑格尔心中复燃，“理性和自由”牢牢占据了他思想的中心<sup>②</sup>。他着力凸显宗教的理性根基，从道德而非情感角度去理解宗教的内核，认为“一切真正宗教（基督教包括在内）的目的和本质就是人的道德”，人对神的认识归根到底不是传播神的“名”，而是为了产生道德<sup>③</sup>。在《耶稣传》中，他把耶稣塑造为一个宣传道德宗教教义的教师，强调耶稣的出现堪称宗教的大转折，道德宗教超越律法宗教，如同近代哲学由客观向主观，由对象向主体的转变一样，重心由对上帝命令的绝对服从，关心行为的合法性向自我对理性命令的自由服从，关注行为的道德性转变，人的自主和尊严而不是上帝的恩典与荣耀成为宗教的核心价值，“唤醒”潜伏在人心中的道德火花，让人凭借“自己的道德力量”通向神和真理，成为耶稣担负的使命。

黑格尔是受到康德的影响而走向道德宗教的。在康德那里，道德宗教具有双重内涵：一方面，理性是自主的但不是自足的，它虽然能使人达于大善，却不足以使人止于至善（德性+幸

福),也不能抵御恶的意念的侵袭,因此为了真正确保道德自律,他不得不走向宗教,求助于上帝的命令;另一方面,道德宗教仍然是基于人的自主性的宗教,人不是因为上帝的命令而遵守道德律,而是因为恪守道德律才需要上帝的命令,道德是宗教的前提,宗教只是补充道德,以成全人的至善,保持道德意念的纯洁。

黑格尔追随康德,在对基督教道德化的解释上也始终贯穿着两方面的内容:1. 道德自主性,理性是知识和信仰的最高标准,“信仰中本质的东西是道德的命令”;2. 上帝命令的必要性,信仰“启示给他的上帝的意志”,“只有通过对上帝的信仰,人才能实现他的最高使命。”<sup>④</sup>对于这两方面的内容,他坚持道德自主性对于上帝命令的优先性,强调不是上帝的喜悦使人履行道德义务,而是道德使得上帝欢喜<sup>⑤</sup>。

康德先验设定了一种恶不断败坏人的道德禀赋,损害德性的伦理自然状态<sup>⑥</sup>。为了建立善对恶的永久统治,人必须走出伦理自然状态组成道德共同体。虽然康德强调只有上帝才能把人“领出”自然状态,但是他仍恪守道德宗教的自主性原则,指出上帝是基于内在的道德法则和道德意念,让人们自愿组成道德共同体。黑格尔在探讨早期基督教社团的形成时,也特别突出了道德自主性是人们加入基督教社团的前提。在他看来,早期基督教社团是人们出于对道德的“承认或信服”,以“共同信仰”为“纽带”自愿联合而成的“向善和坚信进步”的道德共同体。人们对社团只承认“自己加给自己的义务”,除了“他自己承认有按照正义行事的义务,并授予社团以要求他按照正义行事的权利之外,他不授予他的社团对他有任何别的权利。”<sup>⑦</sup>

对康德来说,基督教信仰是基于圣经的、历史性的教会信仰,而道德宗教的信仰则是基于理性的、道德性的纯粹宗教信仰,前者是“救赎的信仰”,后者是在“奉行的善的生活方式中让上帝喜悦的信仰”<sup>⑧</sup>。康德主张对教会信仰进行纯粹宗教信仰的诠释,把经验性信仰解释为道德性信仰。另一方面,教会信仰是理性的道德宗教信仰的导引,应当逐步由前者过渡到后者,直至经验性教会信仰成为多余,“纯粹的宗教信仰最终将统治所有的人”,永久和平的上帝国“降临到我们这里”。

但是对于黑格尔来说,基督教的历史却是从道德宗教蜕化为权威宗教的过程,因此问题就不是历史性宗教如何向纯粹理性宗教过渡,而是“耶稣的宗教怎样变成一个权威的宗教?”“基督教中的权威因素从何而来?”黑格尔在道德宗教

的二重结构中找到了答案。道德自主性与上帝的命令是构成道德宗教的两重因素。在人的自主——自由与神的意志——命令之间,道德宗教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但这种平衡是脆弱的,因为略微颠倒或互换一下前提,道德宗教就会发生蜕变:如果上帝的命令不是以人的道德自主性为条件,相反,上帝的命令是人的道德自主性的条件,那么转瞬之间道德宗教就成转化为权威宗教。这种平衡也是很危险的,因为在双重因素中,上帝的命令本来就是权威性的因素,随时能够打破自主——恩典之间精妙的平衡,使道德宗教蜕化为权威宗教。黑格尔认为,在道德普遍败坏的时代,耶稣在实际宣讲道德宗教时,并没有直接诉诸于唤醒人们的自主性的道德意识,而是诉诸于上帝的意志与他自己的人格力量和奇迹等权威因素,把道德命令建立在上帝命令的基础上,由此就埋下了道德宗教蜕变为权威宗教的种子。在耶稣之后,基督教就完全蜕变为权威宗教,并在罗马帝国时代取得统治地位,理性和自由随之丧失。

在宗教启蒙时代,康德重新恢复了基督教道德宗教而非权威宗教的本来面目,提出了由历史性宗教向道德宗教,由教会信仰向纯粹宗教信仰过渡的宗教启蒙任务。作为康德的信徒,道德宗教的信奉者,黑格尔自觉接过了宗教道德启蒙的任务,继续申张理性的权利,坚称“理性是绝对的,在自身之中完成自己,它的无限的理念仅属于自己本身。”理性不仅颁布道德律,自我立法,而且也有能力使道德律成为主观的,行为的动机,因为“在这个主体内道德规律自身就是立法者,这个规律是从这一主体的内在意识里产生出来。”关键在于通过启蒙,把沉睡在主体中尊重道德律的道德动机“唤醒”<sup>⑨</sup>。

## 二

理性和自由是贯穿黑格尔思想的核心原则,他原本以为能够在康德道德宗教那里找到它们,但是道德宗教内部蕴含的律法——权威因素却使他深刻感受到“统一和自由的丧失”<sup>⑩</sup>。在法兰克福时期,黑格尔重新审视了启蒙道德宗教,并否定自己,对启蒙道德宗教进行了批判。首先,启蒙道德宗教的普遍理性声称是统一性的原则,但是他指责这种理性不但没有统一感性冲动,反而一味排除、“压抑”感性冲动,加剧了和感性冲动的分裂,并进一步导致主体与客体、自由与自然、人与神的统一性的丧失。其次,道德宗教的普遍理性也是自由的原则,但是他批评这种理性并没有带来真正的自由。表面上看人服从他自

己下达的理性命令,是自由的,实际上“普遍成为能统治的,特殊成为被统治的”<sup>①</sup>,普遍理性成为特殊冲动的主人,特殊冲动成为普遍理性的奴隶。律法宗教树立了一个外在的权威,道德宗教却树立了一个内在的权威,自由信仰的道德宗教不过是一种更精致和更隐蔽的奴性信仰的权威宗教。

黑格尔在扬弃了启蒙主义对基督教的道德解释之后,并没有停止寻找对基督教新的解释。在这一时期,他频繁使用三个概念,道德、爱和宗教,它们构成一种递进、补充、成全的关系,即道德成全律法,爱成全道德,宗教成全爱<sup>②</sup>。律法宗教是奠基于客体之上的权威信仰,其历史形态是犹太教,道德宗教是奠基于主体之上的自由信仰,是基督教的启蒙形态。成全“爱”的“宗教”是什么性质的宗教?他没有说。有人用“爱的宗教”来命名,虽无可不可,但似未得要领。我们认为,黑格尔超越道德宗教的“爱”的“宗教”是一种伦理宗教,律法、道德、伦理,代表了宗教发展的三种形态,它们由低到高,形成了一种上升、递进、补充的关系。

黑格尔在其晚期著作《法哲学原理》中明确区分了伦理与道德,他从自由意志出发,把道德和伦理看作自由意志理念发展的两种上升、递增和补充的规定:道德是主观性的意志的法,伦理则是实体性的自由理念<sup>③</sup>。道德是主观的,只有出乎意志的主观故意和意图的行为才是道德的行为,道德也是普遍的,主观意志必须遵循普遍统一的义务才是善的,道德还是自由的,因为道德主体是自由的实现的真实材料。黑格尔虽然肯定道德相对于法而言是自由意志的更高形态,但是他强调道德并非统一性和自由的真实形态,道德仍失之于纯粹的主观性、形式性,不具备意志的客观性和内容,道德普遍性尚不是具体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陷于分裂之中,道德自由还不是实体的自由,停滞在良心的此岸。因此黑格尔所说的道德是康德意义上的,他对主体道德的批判同其早期对康德道德宗教的批判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都凸显了道德之对于统一性和自由的片面性。克服道德片面性,实现统一性和自由的是伦理,伦理是比道德更高和真实的自由意志的形态。首先伦理是实体性的和客观的,是在家庭、市民社会和民族国家这样的实体/共同体中形成的,因此它克服了道德的主体性和内在性;其次伦理“既有客观环节,又有主观环节”,伦理实体/共同体是通过主体构成自身的,伦理整体的规定就是个人的普遍本质,个人只是伦理实体的偶性,伦理实体是调整个人生活的力量。因此伦

理作为统一整体,就是“自在自为地存在的神”。再次,个体不是生活在内在性的道德反省之中,而是生活在伦理实体/共同体中,伦理实体对于主体来说不是陌生的而是它特有的本质,在其中就如同生活在自己的要素中一样,人与伦理实体有一种比信仰更直接同一的关系。伦理就是个体的义务、目的,就是其普遍的行为方式,是其第二天性和风尚,因此伦理建立了实体与个人,神与人的一体的关系,克服了道德对普遍和特殊的撕裂,显示自身为自由的理念。

虽然黑格尔这时还没有明确提出伦理的概念,并用它来表达对主观道德的超越,但是就其实质而言,他用以表达超越法和道德的两个概念,即爱和宗教,其内涵与他成熟时期所使用的伦理的含义大体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在黑格尔那里,就“爱”作为“活生生的纽带”,消解个体的孤立,突破主体内在的限制,化解普遍和特殊的对立,使人融入活生生的生命整体,进入统一性的精神、神之中,成为精神中的精神,神的儿子,在爱中,人与生命全体,人与神完全一体化而言,爱是伦理性的而非道德性的;就“宗教”就是有限的生命提高到无限的生命/精神、神,在精神的应召下,充满圣洁精神的有限生命突破藩篱在神内联合起来,构成一个统一的活生生的和谐的实体/共同体/神圣的社团,即天国而言,就社团内,神人如同父子,作为天国一员,人们相互如同友好的兄弟来说,“宗教”是伦理性的而非道德性。据此而言,“爱的宗教”亦是伦理性的,是建立在对统一生命、精神的理解之上的实体性伦理宗教而非主体性道德宗教。

在图宾根时期,黑格尔曾把爱看作一种经验性的道德情感,但现在他把爱看作是一种超越道德情感的更高情感。赵林教授认为,这种超越道德的情感是一种与神融为一体的宗教情感,显示出黑格尔有一种宗教神秘主义倾向<sup>④</sup>。但是确切地说,他所说的爱乃是一种伦理性的情感,正如伦理关系是实体性的关系一样,伦理性的爱乃是一种实体性的大全式情感。爱指涉的是“作为不同的东西彼此间的关系”<sup>⑤</sup>,是一种生命本体论意义上的,指向生命整全的伦理性情感。伦理性的爱发源于统一的生命,呼唤扬弃反思的对立和异己性,要求个体复归生命的全体,关照生命本身<sup>⑥</sup>。爱朝向无限的生命,在生命“无穷的差别”中寻求“无穷的统一”,“成为一体”。因爱而诞生的生命结合体是“不会再分割开的”,神就在其中“发挥作用”。因此爱是主体间性的,是个体对“生命”相互的伦理承认,“这些有生命的存在具有同等的力量,并彼此相互承认对方

是有生命的，没有一方对对方说来是死的。”<sup>⑦</sup>爱消解了个体的孤立性，使之成为与他人相区别又与他人连为一体的生命。人们的关系不是自主性的道德关系，更不是外在的律法关系，而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内在的伦理关系；人们联合起来组成的整体也不再是原子式的主体联合体，而是活生生的“爱”的主体间性共同体。

黑格尔能够扬弃道德，就在于提出了这种伦理性的爱的观念。在康德那里，基本的道德情感是对道德律的尊重，但这种尊重却导致生命的分裂，主体与客体的分离。爱作为主体间性的伦理情感则是一种联合力量，将“主体和客体、自由和自然”结合起来，恢复人的全面性，把人纳入到活生生的生命整体中。在康德那里，道德尊重还导致理性对感性冲动的排斥性统治，使人丧失了内在自由，而“爱既不统治，也不被统治”<sup>⑧</sup>，让生命获得自由。自主性道德强调法则的普遍性，但普遍法则一旦“必须在特定的情境下，必然地得到特定的应用”，就表现为“特定的道德、特定的义务”，“停止其为绝对的义务了，甚至也可能成为邪恶。”失去绝对性的特定道德义务“必然”相互冲突，难以统一。只有走出自主道德领域进入爱的伦理本体领域，进入活生生的精神全体中，诸道德义务的和解才是可能的。因为爱不是“概念的统一性，而是精神、神性的统一性”，因此在爱中，“道德的一切片面性、道德与道德之间的一切排斥、一切限制都被扬弃了”，生命“投身于生命的全体里、没有界限、在无限之中。”爱就是一种“和谐的感觉”、“同类的感觉”，“特殊的东西不是争执着的，而是共鸣着的”，生命无论强弱彼此同等。

生命因爱而是伦理性的，生命和生命之间是友好的。当生命受到伤害时，就产生了伦理性的恶。生命是对等的，一体的，我在多大程度上伤害了他人的生命，也在多大程度上伤害了自己的生命。“杀人偿命”，天经地义，这义指的是基于生命同等重要的伦理正义。伦理正义是可调和解的，罪恶能够宽恕，命运可以和解，其途径就是爱。爱作为一种生命统一之感，当罪恶在爱的伦理性的“生命的范围内发生”时，生命受到的创伤就会使罪犯意识到，他损害的“是一度对它很友好的东西”，是他自己本来完整的生命，他就会产生对那业已失去了的生命的“向往”，从而消解敌意，“要求重新与生命联合、重新把生命当作朋友来欢迎”，“重新医治它的创伤，使分裂了的敌对的生命重新返回到它自身，并且可以扬弃犯罪行为的罪过、扬弃法律和惩罚。”<sup>⑨</sup>罪恶因此得以宽恕，命运得到和解。

### 三

爱是一种突破生命的疏离、敌对，恢复亲密、友好关系的伦理情感。但是黑格尔认为，爱仅是主观性的情感，它还必须与客观普遍的东西融合在一起，“表现自身于一种客观的形式里”，在爱中出现的生命全体必须客观化为神，才能成为“宗教崇拜的对象。”生命本身也有一种把主观和客观，情感与对于对象的要求结合起来，“通过幻想把理智在一个美里面、在一个神里面结合起来”的内在需要，这种需要就是人类精神“向往宗教的冲动。”<sup>⑩</sup>而这种奠基于伦理性的爱的客观化之上的宗教不可能是道德宗教，只能是伦理宗教。

在黑格尔那里，宗教所以是一种伦理性的宗教，就在于他把神和人的关系理解为一种父子伦理关系。黑格尔把神看作无限的纯粹生命，个人是从无限的纯粹生命中“流射出来的，是无限分割的一部分”，因此神——人关系就是生命对生命的关系，就是整体与部分，树与树枝的关系，神——人“只是同一生命之特殊的表现形态”<sup>⑪</sup>。个体一旦走出自身，进入无限的生命全体——神之中，就会被“光明所照耀”，就能“认识神并认识自己是神的儿女，自己比神软弱，不过本性与神相同”。神是父，人是“神的儿子、特殊的个体”，是父的“变形”，统一的生命使她们处在一种伦理性的关系之中。

神人之间的父子关系在伦理性的圣灵——精神中展现出来。神与人、父与子的综合诞生了精神。精神为神所渗透、充实，与神是完全合一的。精神标志着生命“回复到神性”，而在恢复神性的生命中“降生了人，结束了人的发展的圆圈。”在终结于精神的状态里，“一切事物都生活于神性中，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是神的儿女”。因此这种精神是伦理性的，最初是作为纯洁的“孩子”出现的，表征神与人最原始的统一。它虽然还未发展，却把“与神的合一、联系、和声带进完全谐和的状态，未受到破坏。”随着孩子——精神的发展，神与人分离，并再次“回复到那原始的统一，但这现在已是发展了的、自我产生的、感觉到了的统一。”在经过三个阶段的充分发展后伦理——精神最终成熟了，“现在他认识神了，这就是说，神的精神在他内部了，超出他自己的许多局限了，扬弃了特殊的形态，并且恢复了全体。圣父、圣子、圣灵。”<sup>⑫</sup>

人们通过精神建立同神的伦理关系，成为神的儿子，“并且生活在他们发展了的多面性中和他们整个本质和性格的谐和中。”人进入神中，

神也进入人中,通过神,在神中,所有精神产生了共鸣,“与神圣的东西有了共同性”,形成了“一个声音、一个和音”,生命多方面的意识“谱成一个精神的曲子、许多不同的生活形态唱成一个生活的调子,而且通过这种谐和他们与其他近似神的人之间的隔墙也随之取消了,并且同一个活生生的精神使各式各样的存在具有生命。”所有的生命在活生生的伦理精神中是一致的,他们通过“生活、通过爱而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伦理共同体”,一个神圣的伦理社团,即天国<sup>⑧</sup>。

伦理性宗教共同体不同于道德性宗教共同体。虽然道德性宗教共同体也以友爱的纽带把人们联合在一起,形成统一的社团,但是就其实质来说,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其友爱的纽带是缺乏根基的。这缘于道德宗教共同体是由自主的主体构成的,使他们联合在一起的主要是抽象的“共相”,普遍的“概念”,依赖于主体对普遍道德法则内在的尊重和遵守,以之为行动的纯洁动机,因此他们的联合更像是一种集合,由此形成的共同体更像是“凑合体”,人们相互之间并没有形成亲密的、相同相通的联系,而是独立自主的互为目的的关系。相反,伦理性的宗教共同体是由活生生的精神的人们连接起来;人们虽然是不同的生命个体,但与无限的生命同属一体。神与人,人与人之间是相等相通的,他们是同一生命的变形,是一家人。人们联合起来是为了“生活在神里面”而不是“生活于一个概念里面”。爱是“活生生的纽带”,发自“灵魂的友谊”,人们通过爱,在爱中归属于生命的全体,凝聚为共同体。在其中神是父,“个别成员都是神的儿子”。爱的联合不是形式的联合,而是实质性的伦理精神的联合。生命的差异、多样化并没有把人们分割开来,生命越多样,差异越大,“生命活跃的形态越多、生命联结到和感触到的点越多”,反而“爱越深挚”。通过爱,在爱中,人们共同分享生命的“欢乐”,相互“承认别的是生命”,并“在另外一个人身上重新发现他自己”。在爱的伦理共同体中,充溢的是“相同的精神”,人们基于共同的需要,共同的对象,共同的关系,共同的追求,共同的活动达成精神上的联合,每个生命都被其他生命、共同体“认识到”,“并高兴看到自己是一个促进联合的力量,因为在这种欢乐和游戏中它自己也感到愉快。”<sup>⑨</sup>当然仅仅通过爱并不能建立生命“彻底的联合”,即宗教性的伦理统一。爱只有通过精神与神结合,在复活的耶稣的形象中,才不是纯主观的,爱的合一才有了客观“表现”。在化为神的耶稣身上,“精神与肉体”“重新结婚”,爱就

在他身上生长为“活生生的存在”,在对耶稣的仰望和崇拜里获得满足。

然而黑格尔深刻认识到,在爱和精神中形成的宗教伦理共同体与现实社会的紧张对立。人们在爱和精神中的伦理联合不是把他们推向现实世界,而是把他们从现实世界中剥离出来,生活在“神里面”。世俗的生活和关系被排除在“神圣联盟的活生生的关系”之外,爱和精神性的社团与现实国家是敌对的。但是“国家业已存在”,宗教伦理社团“不能取消它”。世界因此而分裂成两个世界,即上帝之城和凯撒之国。

神——人在爱和精神中形成的伦理性的父子关系,并不是自然伦理性的父子关系,而是建立在对自然伦理关系的摧毁之上的。耶稣不仅从他所在的自然伦理关系中超脱出来,孤立于他的母亲、他的兄弟和亲戚之外,要求人们“不要爱妻子、不要养小孩、不要成为一个家庭的父亲、一个国家的公民,以便同别的人一起享受共同的生活”,而且还说他来到地上不是带来和平,而是带来宝剑,把“儿子分裂出来反对父亲,把女儿分裂出来反对母亲,把新媳妇分裂出来反对她丈夫的亲人”。由此而来,在精神性的伦理共同体和自然性的伦理共同体之间就存在严重的紧张和对立。而无论耶稣还是宗教社团,都对世俗生活态度消极,要么“在理想中恢复那遁入空虚的生活”,要么在“彼此的爱”中,逃避“命运的支配”,“害怕与世界接触”。在黑格尔看来,这恰是基督教的命运:“教会与国家、崇拜与生活、虔诚与道德、精神活动与世间活动决不能融合为一——这就是基督教教会的命运。”<sup>⑩</sup>

我们看到,为了克服近代康德的道德宗教所导致的神与人,人自身统一性和自由的丧失,黑格尔提出了伦理宗教的观念,以此恢复神人,人自身的统一性和自由,但是他在作为伦理宗教的基督教那里并没有看到这一点。虽然伦理性的基督教能够在超验、神圣的层面实现统一和自由,却又导致超验和现实、神圣和世俗之间的对立和紧张,产生了和启蒙道德宗教一样的后果。而超越的伦理宗教的这种内在困境反过来必将进一步推动黑格尔深入思考拯救统一和自由的新途径。

#### 四

赵林教授认为,黑格尔早期宗教思想是其整个思想的发源地<sup>⑪</sup>。这个判断我们认为是确切的。就整体来看,从图宾根到伯尔尼,黑格尔基本上处在思想的探索阶段,尝试对基督教进行一种启蒙主义的道德化解释。但是在法兰克福时期,他的思想开始形成,他已经超越启蒙现代道

德,站在比康德更高的地基上审视过往,眺望将来。律法、道德、爱和宗教所形成的逻辑递进关系表明,黑格尔掌握了启蒙道德宗教的真理,伦理性的“爱的宗教”的形成使他能够克服律法的外在性,道德的主观性,也能够扬弃启蒙道德所导致的主体与客体,人与人,人与神之间的分裂以及对人的内在的奴役,真正实现生命的一统和自由。

1800年黑格尔离开法兰克福到耶拿,由此正式走上了形成和发展自己思想体系的道路。如果说在此之前他思考的中心是宗教,在耶拿时期则转向哲学。但他的哲学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冒出来的,而是从其伦理性的“爱的宗教”中孵化出来的,是其逻辑发展的必然果实。正如黑格尔专家伍德所说,黑格尔思想的发展是连续的,他对康德道德“空洞的指责”从法兰克福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耶拿时期<sup>②</sup>。黑格尔在《论自然法的科学探讨方式》<sup>③</sup>(1802)和《伦理体系》(1802—1803)等手稿中,基本形成了超越主体性道德的实体性的伦理思想体系,而在1803到1804年的讲演中,又进一步发展了其实践的伦理生活体系<sup>④</sup>。他的这种伦理生活体系,一方面是对早前伦理性的爱的宗教的发展,继承和深化了其伦理性的思维方式,把整个社会生活看作一个统一的实体,强调共同体对于个体的优先性,个体是生活在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中的具体的人,另一方面则是对伦理性的爱的宗教的否定,由超验的伦理世界转向感性的生活伦理世界,试图建构现实伦理世界中的统一和自由。

在耶拿后期写的《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初次系统阐述其哲学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伦理是其实践——精神哲学的核心观念。他不仅把希腊社会看作完美和谐的真实的伦理世界,还把希腊艺术宗教解释为一种扎根于真实伦理世界中的伦理性宗教,“艺术的宗教属于伦理的精神”<sup>⑤</sup>。他称基督教为启示宗教。虽然他没有明确说它是伦理宗教,但是从他着眼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伦理关系阐释基督教来看,所谓启示宗教本质上也是一种伦理宗教,不过是比希腊世俗性的伦理宗教更高的超越的神圣的伦理宗教。在这里,限于篇幅,不可能详细展开论述,只需要指出一点就可见启示宗教的伦理性质:黑格尔所谓启示宗教即绝对宗教,这种宗教作为自己知道自己精神的精神宗教不是基于内在信仰称义的主体宗教而是建基于宗教社团之上,通过宗教社

团精神意识到自己,实体返回到自己、成为普遍主体的实体——主体宗教,整个精神——神是在其宗教社团中认识和实现自己,并在其中生活的,乃至在最后的圣灵王国,绝对精神就是它自己的宗教社团,“这个社团的运动作为自我意识的运动,就是把已经成为潜在的东西实现出来的过程。”<sup>⑥</sup>因此,就宗教精神不是在信仰中展开而是在社团/实体中发展的而言,这种宗教不是道德宗教而是伦理宗教。

(责任编辑:無邑)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8JC870001)、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20090461061)、江苏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项目(2009JDXM033)、教育部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创新基金(3213000501)阶段性成果。

①③④⑤⑦⑨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黑格尔:《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上,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67,227,114,154,164,261,306,382,414,512,382,499,498,494,398,457—458,428,441,445,447,470页。

②黑格尔:《黑格尔通信百封》,苗力田译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8页。

③④康德:《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1,115页。

⑤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程志民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4页。

⑥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41,108—9,161—2页。

⑦⑧赵林:《黑格尔的宗教哲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9,109页。

⑨⑩Wood, *Hegel's Ethical Thou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31, 131.

⑪在这篇论文中,黑格尔首次明确阐发了其伦理观念。他仍然从无限和有限,普遍和特殊的关系方面,就统一性和自由问题,提出和思考伦理的本质。如果说此前他用“爱的宗教”表示对统一性和自由的伦理宗教意义上的理解,那么此时他把真实的统一性和自由直接领会为伦理性的。他直言,伦理之为伦理的本质在于其绝对的统一性,普遍和特殊的统一是伦理的绝对生命的理念,民族就是绝对的伦理实体,而个体是构成绝对伦理实体的有机体,绝对伦理的理念在充满活力的所有人的共同存在和活动中成为“活生生的伦理现实”。《论自然法的科学探讨方式》,程志民译,《哲学译丛》,1997年3、4期。可以看出黑格尔的这种伦理理念直接来自其早期的宗教思想,是对伦理性“爱的宗教”的伦理学的转化。

⑫⑬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29,251页。